

活页文史丛刊

121-150

沂阴师志编年

· 图书文献专题 ·

淮 阴 师 专 编

淮阴文史丛刊

121

新发现简帛与秦汉文化史

李 学 勤

(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文字研究室)

中国有着悠久辉煌的古代文化，传世典籍数量极多，素有“浩如烟海”之称，但历史上也有很多著作，由于种种原因遭到散失湮没，甚至书名都不为后人所知。还有不少古书，在千百年的传流过程中不免改易脱漏，已经不能保存原有面貌。这种情况对我们探讨古代的历史文化是很大的妨碍。地下发掘出土的简帛古籍，使人们直接看到用纸以前的书籍，为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宝贵线索。

西晋咸宁五年（公元279年），在今天的河南省汲县地方，从一座战国大墓里发现了大批竹简。晋朝政府对此颇为重视，动员了当时知名的学者。如荀勖、和峤、束晰等人，对这些竹简进行了研读整理。据他们的记录，竹简共有

七十五篇，包括佚书近二十种。他们辛勤整理出来的《竹书纪年》、《穆天子传》、《师春》等书，内容多与秦汉以来流行的学术观点有异，开拓了人们的眼界，有些书至今仍为学者所珍视引用。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“汲冢竹书”。晚近关于简帛的几次发现，如敦煌、居延等地的汉晋简，长沙的楚国帛书，都对学术发展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文物考古工作发展迅速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最近几年，各地陆续出土了几批简帛古籍，其种数之多，内容之重要，实不在“汲冢竹书”之下，业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。其中最重要的，是下面介绍的五批：

（一）睡虎地竹简：

1975年底，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中发现。从简文知道，这座墓葬中的死者名喜，是秦始皇时的狱吏，卒于始皇三十年（公元前217年）。竹简原来成卷地随葬在棺内，总数近一千二百支，大部分保存良好，字迹十分清晰。这批秦简的复原整理工作现已结束，共书十种，主要是秦的法律和文书，其书写时代系战国末至秦始皇时期。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现秦代的简书，在我们要介绍的五批简帛中是年代最早的一批。

（二）马王堆帛书：

1973年底到1974年初发掘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，据研究是汉初长沙国相利苍的儿子的墓葬，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（公元前168年）。墓里出土的大量帛书，原来多数收藏在一具漆奁里，有的折叠成长方形，有的卷在一块作轴的木片上。帛书的文字都很清楚，有些件在文

字行间有朱丝界栏，还有绘着彩色图画。马王堆帛书的拼复工作已基本完成，一共有帛书二十六件。从字体、避讳等方面鉴定，其书写年代早的可到秦代，晚的属于文帝时期。在这座墓中，还出土了四篇竹、木简书。

（三）双古堆竹简：

出土于1977年秋季发掘的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。墓中漆器上面的铭文说明，墓主是汝阴侯，据推断应为汉初功臣夏侯婴之子夏侯灶，卒于汉文帝十五年（公元前165年），比马王堆三号墓只晚三年。竹简本来贮放在木简内，因墓室久已坍塌，竹简受到长时期重力挤压，已粘结在简板上。现正用科学方法努力剥离，确切的简数还难于估计。考察目前已经取下的竹简，可知其内容至少有六种古书，大多书写于西汉初期，有的也可能早到秦代。有些支简上绘有朱红色的栏线，是在别的几批简上没有看到过的。

（四）银雀山竹简：

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发掘于1972年四月。所出竹简连同碎片合计有七千多号，估计原来有整简近二千支。这座墓的年代，据同出银币、陶器等考察，当为汉武帝前期，在公元前140年至118年之间。竹简的字体，看来也比马王堆帛书和双古堆竹简略晚一些。简的内容，除已确定书名的子书五、六种外，还有佚书多篇。这批简由于残断较甚，仍在陆续整理之中。

（五）八角廊竹简：

1973年冬发掘的河北定县八角廊村40号汉墓，据研究，墓主可能是汉中山孝王刘兴，其卒年为汉成帝绥和元年（公元前8年）。墓内发现满盛竹简的竹简，由于墓室早

年被盗后焚烧，竹简已全部炭化，但字迹仍可辨识。这批竹简尚未整理完毕，已知至少有六种古书，有些简的书法非常优美，有较高艺术价值。

上述五批简帛古籍，内容真是缤纷满目，这里只能择要提到其中一些最珍贵的发现。

在经籍方面，首先应提到马王堆帛书中的《周易》和《易传》。帛书《周易》的经文大致和今本相似，但有不少重要的异文。

《易传》的一部分同于今本《系辞》，另有大段文字是今本所没有的。《周易》是极为重要的古代哲学典籍，帛书的发现为研讨《周易》哲学，特别是关于辩证法的思想，提供了新的材料。

双古堆竹简中的《诗经》也很重要。现在已经清理出来的部分，和今本《毛诗》有许多不同，但可肯定也不属于齐、鲁、韩三家诗。《诗经》是中国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，竹简《诗经》的发现，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是一个很好的消息。

双古堆竹简还有重要的小学书《仓颉篇》。众所周知，秦代李斯作《仓颉篇》，赵高作《爰历篇》，胡毋敬作《博学篇》，是当时学习文字的读本。汉代学师把三篇合在一起，仍以《仓颉篇》为题。这是一部在中国文字学上有很大意义的书，可惜久已佚失。古书中只保存了零星几句引文，敦煌、居延汉简曾发现此书，也不过少数几条。双古堆竹简《仓颉篇》文字较多，而且有些文句和汉以后流传的不同，很可能还是秦代的原貌。

在史书方面，睡虎地秦简中有一卷《编年记》，逐年记

述从秦昭王元年（公元前306年）到始皇三十年（公元前217年）的历史大事。前面我们曾谈到“汲冢竹书”中的《竹书纪年》，该书的记载止于魏襄王二十年（公元前298年），有不少学者用它来纠正《史记》的错误，获得很重要的成果。《编年记》刚好可以看作《竹书纪年》一书的续编。

马王堆帛书有《春秋事语》和《战国纵横家书》二种。《春秋事语》共十六章，记载春秋时代的史事，大多和《春秋》经传及《管子》、《韩非子》等古书相合。书中有《燕大夫》一章，涉及燕、晋间的战争，不见于传世史籍，是很珍贵的史料。《战国纵横家书》是西汉晚年刘向编辑的《战国策》的前身之一，共二十七章，有十六章不见于今本《战国策》，其重要性不难想见。

简帛中的诸子著作，种类很多。属于儒家的，有八角廊竹简《论语》、银雀山竹简《晏子》等。属于道家的，有马王堆帛书《老子》、《黄帝书》、《伊尹·九主》和八角廊竹简《文子》等。《黄帝书》有学者认为就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的《黄帝四经》。《文子》与今本只有部分相同，而与《艺文志》所述相符。

关于兵家的书在简帛中占有很大比例。银雀山竹简有《吴孙子》（《孙子兵法》）、《齐孙子》（《孙臆兵法》）、《六韬》、《尉繚子》等多种。《齐孙子》的发现最值得注意，因为这部兵书在魏晋以来就失传了，甚至有人曾怀疑它是否存在过。马王堆帛书和双古堆竹简都有《刑德》一类书籍，而且不只一种。《刑德》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分类法中列为兵书的兵阴阳类，讲的是有关军事的术

数占验，对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也有一定参考意义。

马王堆帛书《五星占》和《天文气象杂占》，是异常珍贵的古代天文学资料。《五星占》详列了秦始皇元年（公元前246年）至汉文帝三年（公元前177年）金星、木星、土星的位置。《天文气象杂占》有各种天象的彩色图绘，比敦煌卷子《望云气书》更为详尽。帛书里有两幅大型地图，一幅是《长沙国南部图》，一幅是《驻军图》。这是现已发现的中国最古的地图。两图都有比较准确的比例，所绘山川基本正确。所记城市聚落，最近经考古调查，证明不少尚有遗迹可寻。

帛书中的医书有十余种。《五十二病方》、《养生方》、《杂疗方》等，是已知的中国最早的医方专书。《五十二病方》卷前另有几篇文字，是中医经典《内经·灵枢》中《经脉篇》的祖本。与生物知识有关系的，有马王堆帛书《相马经》和银雀山竹简《相狗经》。这一类书籍，按《汉书·艺文志》多应归类于方技术数之类。

同样应列于术数的，还有睡虎地竹简《日书》（两种），是选择吉凶日辰的书。马王堆帛书也有两种《阴阳五行》。这些佚书可以作为探索阴阳家思想和古代民俗和神话的资料。

上面提到的大量简帛古籍，大多数是前所未见的佚书，少数有传本的也多与今本不同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这些“惊人秘笈”的发现等于给我打开了一座丰富的地下图书馆。许多全新的材料，迫使我们秦汉文化史上一些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作出新的考虑。

首先，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化传流的问题。

春秋战国时期“百家争鸣”的学术繁荣局面，随着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等东方六国被强秦吞并而宣告结束。秦始皇在称皇帝之后，不久就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，禁毁《诗》《书》百家语，颁布了《挟书令》（禁止持有书籍的法令）。接着到来的，是农民大起义和楚、汉相争的动荡时代。所谓《挟书令》，到汉惠帝时得到撤销，但新的文化繁荣要到文帝时期才开始出现。从秦代到西汉初年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，文化传流的情况如何，过去的了解从来是很少的。

李斯在向始皇的建议中说：“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。非博士官所职，天下敢有藏《诗》《书》百家语者，悉诣守、尉杂烧之。有敢偶语《诗》《书》者弃市，以古非今者族。吏见知不举者，与同罪。令下三十日不烧，黥为城旦。所不去者，医药、卜筮、种树之书。若有欲学法令，以更为师。”睡虎地秦简和马王堆帛书中可确定属于秦代的写本，证实了《史记》上引这段话。

秦简共书十种，即《编年记》、《语书》、《秦律十八种》、《效律》、《秦律杂抄》、《法律答问》、《封诊式》、《为吏之道》和两种《日书》。《编年记》如前所述，是所谓“秦记”一类秦人编写的史书。《为吏之道》是秦人编纂的供学作官吏的人使用的读本。《日书》则是卜筮一类的书。尽管睡虎地十一号墓的年代略早于李斯的建议，竹简的内涵却与李斯限定的允许范围相合。这是因为禁止《诗》《书》百家语，本来是商鞅以来秦国一贯的政策。

马王堆帛书中肯定是秦写本的，一件是《篆书阴阳五行》，书中避讳“正”字，把“正月”改为“端月”。另外《五十二病方》从字体看也可能是秦代的抄本。这两种书

籍，前者是术数之类，后者是医药之书，都不在禁毁之列。这也可说明，秦朝的法令当时是发挥了相当作用的。

秦统治者禁绝《诗》《书》百家之学的原因之一，是企图用秦国的传统文化统一中国的文化。然而，睡虎地帛简表明，秦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，实际在很多方面落后于六国。这方面一个主要的标志是，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着奴隶制的残余。

秦简中的奴隶，有官府奴隶，也有私人奴隶。秦政府官有的奴隶，主要是隶臣妾（男奴隶叫隶臣，女奴隶叫隶妾，到汉代隶臣妾转化为有期限的刑徒名），其来源是罪犯或投降的敌人之类。私人所有的奴隶，称为臣妾，或沿用《周礼》的古名，称为“人民”。无论是官有还是私有的奴隶，都使用于农业及手工业的生产，都可以在市场上公开买卖。《封诊式》中有一个典型的案例，题为《告臣》，记载某地某里有一个士伍（没有爵位的男子）甲，把他所有的一个名叫丙的男奴隶捆送官府，说：丙是甲的奴隶，他骄悍不肯耕作，不听甲的命令，就把丙按市场的标准价格，卖给官府，叫他服城旦的刑役。这种典型的野蛮的奴隶制关系，在秦简各种律令中有很多反映。

正由于秦国的文化传统是落后于六国的，它并未能创造出可观的文化成果，来替代曾达到相当繁荣的六国文化。简帛中值得称道的秦文化的产物，只有条目繁多的法律，成为汉律的依据和凭借。秦亡以后不久的墓葬中，《诗经》和百家语（各种子书）就纷纷出现了。这说明，秦朝的禁令和秦汉之际的动乱，所造成的只是学术文化暂时的低潮，并没有真正截断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流。

其次，是“楚文化”的历史作用问题。

若干年来，中国和外国都有不少学者，把注意力集中于

楚国历史和考古的研究。这一方面是由于自四十年代以来，古代楚国地域内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，不时有惊人的成果；另一方面是因为楚国雄踞南方，领域广袤，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上本有其特殊的地位。有些学者在著作中应用了“楚文化”这个词。

我想读者已经注意到，我们这里谈到的五批秦汉简帛，其中四批出土地点是在原来楚国的领域之内。帛简的发现地湖北云梦，战国时属于安陆，是楚国北部的要地。秦昭王二十八年（公元前279年），命白起率军攻楚，“拔郢、邓五城；其明年，攻楚，拔郢，烧夷陵，遂东至竟陵”。秦简《编年记》载，秦军“廿九年，攻安陆”。此后这一带归秦所有。湖南长沙和安徽阜阳都是楚国的心腹地区。山东临沂地区，则是在楚灭越之后划入楚国版图的。这些出有简帛的墓葬，从考古学看也都带有显著的“楚文化”的影响痕迹。

应当指出，即使是占领楚地的秦人，也不能不受“楚文化”的浸润影响。睡虎地竹简的主人是秦人官吏。有证据表明，睡虎地的秦墓埋葬的可能都是秦人而不是楚地的土著。但是，竹简中的《日书》实际集中体现的是楚国的传统信仰，反映了楚人尊尚巫鬼的习俗。为了秦人能按照楚人的方法选择吉利的时日，在《日书》里还专门附有一份秦、楚两国月名的对照表。

马王堆帛书有不少是楚国人的著作，具有鲜明的“楚文化”的特点。试举《五十二病方》为例。这是一部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医药方书，书分五十二章，每章用一种疾病作为标题。细读全书原有的目录，可以看出很多是南方多见的疾病，如“蛭蚀”（水蛭咬伤）、“虻”（蝮蛇咬伤）、“冥病”（麻疯病）之类。书中药物有时特别说明荆楚地区的土

名，如“牝痔”章第一方说：“青蒿者，荆名曰萩；菰者，荆名曰卢菇。”很明显，这部珍贵的方书是楚人辑集的，它代表了楚国的医药学水平。

《五十二病方》和其它帛书医书经常用“知”字表示病的痊愈，这是楚人的方言。中医最重要的经典《内经》也常用这个词。现在我们知道，《五十二病方》卷前的医学理论文字是《内经》的来源之一。由此可见，《内经》可能相当大的部分是楚国的作品。

更重要的是，帛书《黄帝书》的发现，证明了战国直到汉初一直流行的黄老之学，其根源实出于楚国。《老子》的作者是楚苦县人，早见于《史记》，但所谓“黄”内容是什么，有什么地域特色，前人是无所知的。考察《黄帝书》，其文字很多类同于《越语》、《淮南子》，显然是长江流域思想文化的结晶。

黄老之学是道家的一种分支，在战国中晚期思想界有相当强大的势力。在几个诸侯国握有统治权的法家人物，颇多学习黄老，如韩国的申不害和韩非，齐稷下的赵人慎到，都以其学归本于黄老。汉代窦太后好黄老术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，仍把黄老列为首位。通过马王堆帛书《黄》《老》的研究，进一步揭示楚文化与黄老思想的联系，将是打开中国文化史许多疑谜的重要钥匙。

最后，我们想谈一下对某些传世古籍的评价问题。

几批简帛古书的发现和研究，意外地给一些长期被人们否定抛弃的传世书籍，带来了新的曙光。

一个例子是《尉繚子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有两部书题为《尉繚》，一部列入杂家（注云六国时），一部列入兵家。今本《尉繚子》从内容看应属兵家，但篇数与汉志不

合，其最早版本只可推至宋代。唐代《群书治要》中只节录了四篇。今本文字很不古雅，因而研究古籍辨伪的学者大都斥为伪书，近现代有关中国思想文化的著作，没有一本提到《尉繚子》这部书。

令人惊奇的是，在银雀山竹简中竟有六篇与《尉繚子》相合的文字。整理者精心研究的结果，知道其中五篇可能原编为一书，另有《兵令》一篇，文字与今本《尉繚子》的《兵令》上下两篇相合，不过据同出篇题木牍，它原来是和不见于今本《尉繚子》的几篇文字合编为一书的。不管怎样，既然银雀山出土有这些文字，《尉繚子》一书是先秦古书已无疑问。

对照竹简和今本《尉繚子》间互相对应的段落，不难看出简本的语言本来是颇为古奥费解的，今本之所以失掉古雅的色彩，是于后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，使之较易理解的缘故。这就象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常用的办法一样，把所征引的古书里费解的词句，用通俗的字样替换了。《群书治要》选收的几篇，文字较接近简本，宋以后的版本改易更多，以致把本来面貌都失掉了。

和《尉繚子》相似的例子是《六韬》。今本《六韬》也久被认为伪书。现在银雀山竹简里也发现《六韬》，所以这部先秦古书的名誉同样应予恢复。

另一种例子是《鹖冠子》。这部书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注云作者系“楚人，居深山，以鹖为冠”。《书中世兵》篇有一些文句与汉代文学家贾谊的《服鸟赋》相近似，唐朝柳宗元因此写了一篇《辨鹖冠子》，认为此书“尽鄙浅言，好事者伪为其书，而用贾谊《服赋》文饰之”。此后便

很少人敢引用这部子书了。现在我们虽然没有发现《鹖冠子》，但是马王堆帛书《黄帝书》和《伊尹·九主》等篇，有好多语句同《鹖冠子》类似。例如《九主》有“虐下蔽上”一句，《鹖冠子·近迭》作“遁下蔽上”，陆佃注：“遁之言午也。”可以看出，《鹖冠子》确实是战国晚年楚国人的著作。贾谊在汉文帝时为长沙王傅，曾居住在长沙，《鹖冠子》与《服鸟赋》的近似，其实是贾谊袭用了《鹖冠子》，柳宗元完全把事实颠倒了。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，决不应忽略《鹖冠子》这本古书。

还有一种情形。在隋代医书《诸病源候论》和唐代的《千金要方》中，都录有一篇论孕妇保健的文字，《千金要方》本称之为“徐之才逐月养胎方”。徐之才是北齐名医，所以这篇文字看来是他的作品，历来无人怀疑。现在，马王堆帛书有一种专论妇产科问题的医书《胎产书》，书的第一大段就是这篇“逐月养胎方”，文字基本上是相合的。《胎产书》是秦汉之际的写本，所以“逐月养胎方”实际也是一种先秦的著作。这样的发现，不能不说是出人意料的。

一系列事例说明，前人对某些传世古书的见解不一定是可靠的。中国对古籍的辨伪工作，从宋代开始兴盛。清代以来更有不少学者作了很大努力，去伪存真，成绩很多。不过他们对地下埋藏的原本古籍未能接触，关于文化发展和古书形成的看法不免有较大的局限性。我们应当根据简帛古籍的研究，对古籍辨伪从方法论到具体结论，进行一番科学的检讨，使我们对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发展。

附记：这是一九七九年我出访时准备的文稿，综合了我近年几篇文章的论点，今略作修改。其中部分内容已在《楚文化讨论集》发表。

古典文论丛刊

122

· 中国古代文论学术讨论会文言摘编 ·

编者按：“风骨”“文气”为当前高校古代文论、文学史、文艺理论、美学课程必涉的问题，争论分歧颇大，亟需参考资料。本摘编由本刊编辑根据1980年11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速记、录音，论文和作者手稿整理，部分文字未经作者审阅，如有错误由我们负责；将正式发表的专论只作简要摘录，以避重复。

风 骨 辨

詹 鏖（河北大学中文系）：

“风骨”“文气”等文论术语涉及古典文学、古代文论直至当代文艺理论之研究，也是中文系科教学里素有争执的难题。但无论是品评人物、书画、诗文，“风骨论”都属于美学范畴。从黄侃以来，对“风骨”的争论，往往纠缠在“文意”“文辞”和“事义”上。其实《文心雕龙》在论述

“风骨”时，主要是从“风格”着眼的。

古罗马朗加纳斯（Longinus）《论崇高》（英译为 On Sublime）所谓“崇高”也含有奇特、雄伟、壮丽的意思。有趣的是，《文心·风骨篇》和《论崇高》虽无传承关系，可是在强调真情实感、文章教化方面，却都是以义正辞严、情调激昂、意气骏爽的风格来对抗当时败坏的道德、萎靡的文风，两者在提倡文章的庄严、恢宏、遒劲、清明、刚健、真实等等方面，确实有很多类似之处。

文艺风格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，分析风格是既离不开作家作品的思想感情，也离不开艺术技巧的。说风骨只是文意，是文辞，是事义，只能解释《文心》风骨论的局部问题，而不能理解它的精神实质。

“风骨”在魏晋时代文论里，主要指后世所谓“阳刚之美”。《文心·体性篇》云：“气有刚柔。”《熔裁篇》说：“刚柔以立本，变通以趋时。”姚惜抱《复鲁絜非书》论阳刚之美云：“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，则其文如霆如电，如长风之出谷，如崇山峻崖，如决大川，如奔骐驎……”《论崇高》第一节也说：“崇高风格到了紧要关头，象剑一样突然脱鞘而出，象闪电一样把所碰到的一切劈得粉碎，这就把作者的力量在一闪耀之中完全显现出来。”（据朱光潜译文）

《文心·时序篇》论建安文学道：“观其时文，雅好慷慨，良由世积乱离，风衰俗怨，并志深而笔长，故梗概而多气也。”这就是后世所谓“建安风骨”，也就是钟嵘《诗品序》里所说的“建安风力”。陈子昂《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》慨叹“汉魏风骨，晋宋莫传”，而推崇“骨气端详，

音情顿挫，光英朗练，有金石声”的诗作。这种慷慨激昂、清明刚健的诗风，经过陈子昂、李白等的提倡，到了盛唐时代，成为诗歌的主流。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选盛唐诗歌，自称“言气骨则建安为传，论宫商则太康不逮”。他所谓独具“风骨”者，大都是边塞诗，而边塞诗正是以刚健激昂的独特风格反映现实生活的。

《文心·风骨篇》多处倡导刚健的诗风，一篇短论，“力”凡六见，风骨似乎就是“力”的表现。朱光潜先生说：“没有理由可以断定文章风格的雄伟就不能产生审美的‘崇高’效果。”（《西方美学史》上册，第98页）风格上的刚健和审美上的“崇高”是有共通之处的。康德所谓“力量的崇高”，就兼指艺术作品的巨大力量和气魄。

《文心雕龙·风骨篇》赞语里的“蔚彼风力，严此骨鲠”，就已说明了什么是“风”，什么是“骨”。蔚是云气盛的样子，“风”就是一种动力，一种能够打动人的感情的气力。《毛诗序》也说：“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。”“骨”就是“骨鲠”，就是骨力。骨鲠也写作骨梗，是梗直的意思，所以说“结言端直，则文骨成焉”。它具有庄严高峻的特点，“结言端直”就是义正辞严，所以才说“风清骨峻”，“严此骨鲠”。这不是和郎加纳斯所论的崇高风格，有很大的类似性吗？

祖保泉（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）：

《文心雕龙》风骨之“风”，是从《毛诗序》那里继承过来的，在“风”之教化作用上两者一致，但又不尽同。刘勰说：“情与气偕。”把“情（志）”和“气”联系起来，

也就把“气”和“风”结合起来。诗人，由于有蕴之于内的气和情志，才有发之于外的风。所以他说“风”是“志气之符契”，这就把“风”和作家的创作个性联系起来。他就认定“风骨”之“风”的特点是：文思刚健而充实，爽朗遒劲而又能激动人心。这样文章便有动人的“风”，感人之力”。

骨，《文心》说：“沈吟铺辞，莫先于骨。”“辞之待骨，如体之树骸。”“结言端直，则文骨成焉。”“故练于骨者，析辞必精。”……可见文章的情思，是一篇文章的主心骨；如果文章的情思明确，体现这情思的文章意脉清清楚楚，那末写作时，要求“结言端直”“析辞必精”，结响不滞，才有准绳、有依据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，“风骨”之“骨”，包括三个重要因素：一、文章意脉清楚；二、用词精当；三、语调朗畅。

这，对写骈文更有特殊意义。骈文，既讲究铺陈词藻，又讲究据事类义，稽古论今。这一来，很容易犯“瘠义肥辞，繁杂失统”的毛病。救治之药在内容充实，措辞精练，意脉清楚。骈体易给人以“乱”的感觉，救治之方在意脉贯通，层次清楚。骈文要求“潜气内转”，气指文章意脉，而意脉要“内转”，所以要在意脉贯通、层次清楚上下功夫。——刘勰倡导风骨，反对“繁杂失统”，要求“意断而不乱”，就是针对当时骈体泛滥、文风淫靡提出来的。

马宏山（新疆大学）：

从魏晋时开始出现的“风骨”一词，一般用以指人的品格（如《南史·宋武帝纪》谓其“风骨奇伟”）。以后也用